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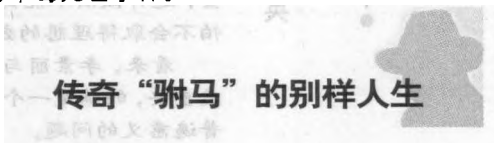
权势、金钱、政治斗争，埃及前总统女婿马尔万的离奇死亡，包含了精彩故事所有的必需元素。这个被指为双面间谍的马尔万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谜底有没有可能被揭开？



埃及前“驸马”的谍之劫

■ 宗 宁

2007年6月27日，英国伦敦再次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埃及前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女婿、亿万富翁阿什拉夫·马尔万被发现于其豪华寓所外神秘身亡，死因有失足坠楼，因病自杀及谋杀等多种版本。此前有关马尔万其实是埃及和以色列的双面间谍的媒体报道和传闻沸沸扬扬，类似的情节不禁让人回想起去年11月的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科离奇中毒死亡事件。



马尔万属于不折不扣的当代“驸马”，其岳父是鼎鼎大名的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纳赛尔是

埃及“7·23起义”的主要发起人，在任内曾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领导埃及军民奋力反击以色列发动的“六五”战争，还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马尔万出生在埃及的一个富有家庭，其父曾是纳赛尔总统卫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他自己在获得化学工程学位后也加入了军队。但他的理想远不止成为一介武夫，他把目光直接瞄准了权力的“金字塔顶”——第一家庭。于是，在大胆追求纳赛尔的女儿穆娜，并成功俘获少女的芳心后，马尔万于1966年迎娶了时年

19岁的总统千金。

马尔万是个很善于走“泰山路线”的“乘龙快婿”，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他婚后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中窥见一斑。而如此不同凡响的庇荫，也自然注定了他的人生要比别人来得更腾达跌宕。马尔万很快成为纳赛尔的得力助手，代表纳赛尔本人游历世界，广交朋友，其职责可能相当于今天的“亲善大使”之类。这样一份肥差和美差非“驸马”莫属，马尔万也的确不辱使命，利用他的长袖善舞，积极帮助纳赛尔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改善邦交、树立威望。更重要的是，精明的他有意培植和积累起来的丰厚人脉，更成为其日后受用不尽的一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军火生意就是一个例子。纳赛尔去世后，马尔万仍未脱离核心权力阶层。他摇身成为新总统萨达特的政治和安全顾问，还曾担任阿拉伯国家资助埃及发展武器工业的“阿拉伯工业组织”负责人。这些职位意味着令人艳羡的巨大利益。通过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大量军火交易，马尔万的个人财富也在急剧膨胀。有人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是他的最大主顾之一，他通过源源不断地向利比亚输入武器，换得在利的豪华酒店经营和石油开发权。由于利比亚当年因遭严厉的制裁无法进行国际贸易，可以想见马尔万的军火生意掘金速度之快和利润之高。传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个人资产已达3.4亿美元。

1982年，马尔万突然举家移居伦敦，其中是否别有隐情不得而知。不管怎样，在伦敦，马尔万继续着他的亿万富翁生活。有很多消息描述他的奢靡铺张，如他在伦敦的高所位于可俯瞰圣·詹姆斯公园、与白金汉宫和女王卫队驻地毗邻的“卡尔顿豪宅区”，在“全世界最

昂贵的街”——巴黎第50大道上为其妻子穆娜购买了一套豪华的公寓，拥有西班牙马略卡岛上最著名的酒店；经常大批采购昂贵的珠宝首饰，还购买了一架“费尔康”私人喷气机进出巴黎和往来世界各地，只是为了方便吃法式大餐等。此外，马尔万也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他是切尔西俱乐部前老板肯·贝茨的好友，一度曾拥有“切尔西村”3%的股份；还曾是英国哈罗兹百货商店老板穆罕默德·法耶兹的密友；与沙特阿拉伯军火巨商阿德南·哈肖吉、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交情颇深。可以想见，马尔万之死在伦敦及阿拉伯世界引发的震动。

祸从“谍”起——谁该为赎罪日战争赎罪？

三年前，美国作家霍华德·布卢姆在著作《毁灭前夜》中详细披露了马尔万曾经充当间谍的内情。书中描绘马尔万早在1969年就前往以色列驻英国的大使馆，希望为以色列摩萨德效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尔万向以色列方面提供了大量有关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宝贵情报。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他还向以色列发出了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向以色列开战的警告。

但也有指证称马尔万其实是名双面间谍，他在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同时，也利用假情报干扰以色列政府进行决策。对于这些指控，马尔万一概予以否认。尽管如此，马尔万表面平静、惬意堂皇的生活还是被无情地打破了，此后，马尔万一直担心遭到暗杀。结果，他还是没能逃脱残酷命运的追逐。

事情要从1973年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进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或十月战争）说起，这也是阿以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当年，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攻击先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由于埃叙联军发动的是突然袭击，因此在战争之初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在西奈半岛，以军的攻击则越过了原来的停火线——苏伊士运河，直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为止。这场战争历时18天，双方战争消耗超过50亿美元。赎罪日战争对中东各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未来的中东和平进程铺就道路。1979年签署的《戴维营和约》令埃及关系正常化，埃及也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

虽然赎罪日战争的硝烟早已熄灭，与阿拉伯世界联盟更多的为战争早期的进展感到安慰不同，以色列国内针对情报部门为何未能准确预警战争爆发，并导致战争初期以方的失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时任以色列总统的伊弗雷姆·卡齐尔代表最高当局宣布对未能防止战争负责，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最终，当时的总理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达扬将军被免

于追究责任，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南方总司令遭到了撤职。当时的以色列国防军军情部负责人艾利·兹伊拉少将由于战前对阿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作出了“可能性很低”的评估，被推向了政治风暴的中心，舆论认为他应对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溃败负责。

但兹伊拉不愿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为了证明自身的清白，1993年，已离职的他出版了一本名为《虚拟与现实：赎罪日战争，失败与教训》的书，竭力想表明一种观点，即某个提供战争何时爆发的摩萨德间谍实际上是一个双面间谍。该间谍因常年向摩萨德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情报，树立了非常高的可信度，结果这次他故意晚于准确时间提供了战争爆发的情报。事实上，委员会公布的档案确实提到一名身份特殊的摩萨德高级间谍在战前向以色列提供了埃军闪电突袭西奈半岛的绝密情报，只是晚了四个小时。该间谍的身份一直是被高度保护的秘密，调查委员会只将他称做是“一个消息来源”，但证据显示这个“消息来源”在埃及政府中身居要位。

海外公开了马尔万的名字。

以色列两大前情报机关负责人之间的论争

后来，以色列情报机关的两名前负责人围绕马尔万间谍事件，大举兴讼的直接导火索可以说就是霍华德·布卢姆在其著作中的详细揭秘。前摩萨德负责人塔兹维·扎米尔因此指控身为军方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兹伊拉对媒体的泄密导致对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损害，也使马尔万的生命陷入了巨大的威胁中。扎米尔给以色列总检察

从国家绝密到报章中呼之欲出的清晰谍影

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马尔万是怎样从国家绝密中的“消息来源”变成新闻聚焦的传奇人物呢？要了解这一过程，必须对散见于不同时间和渠道的消息报道进行一番仔细艰难的梳理和考证。2004年10月，以色列记者阿鲁夫·本在《国土报》上发表文章，透露他是怎样发现赎罪日战争中“埃及间谍”的名字的。阿鲁夫·本称，早在80年代后期，他作为特拉维夫当地的《城市报》的记者，被告知那个神秘的间谍在战争爆发的早上告诉以色列当局“战争将在今天爆发”，而且该人在其祖国是名重要人物。且“住在英国，是名大商人，《金融时报》上前不久还有关于他的文章”。当时还没有互联网，阿鲁夫·本在数据库中输入埃及、英国、商人等关键词，结果计算机给出了一篇关于马尔万的文章。

后来阿鲁夫·本读到另一位记者从埃及报纸上引用的一名间谍曾给以色列传递情报的故事的文章，间谍的名字就是马尔万。

又过了几年，已成为《国土报》新闻版面负责人的阿鲁夫·本在参加一次关于赎罪日战争纪念日文章讨论的编辑会议时，提议也许可以写写那个预报战争的间谍的故事，写作任务后来被派给一位叫若农·伯格曼的通讯员。在大量勤勉细致的工作基础上，伯格曼写出了一篇内容精彩详尽的文章。尽管马尔万本人不想接受他的采访，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退休人员向他泄露了整个故事，包括马是否双面间谍。2002—2003年前后，一个叫阿哈龙·布雷格曼的以色列人在



长马佐兹呈交了一份有其他两名前高级情报官员联合签名的投诉信件，退休准将阿莫斯·吉尔巴及上校约瑟夫·兰格兹基他们曾是兹伊拉属下的军情部门研究主管及军情部数据收集中心的负责人。

扎米尔等人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兹伊拉是如何泄露摩萨德高级间谍身份的，即他在为霍华德·布卢姆出书提供帮助时两人的对话，他如何指导布卢姆找到各种线索的源头。据称在有关间谍身份的部分，兹伊拉告诉布卢姆，“在埃及总统萨达特会见沙特国王，告知后者他想要攻击以色列的意图时，该人陪同参加了会议”。为寻求更多有帮助的资讯，布卢姆还被指点去找阿哈龙·布雷格曼。扎米尔等人声称，是自身的最高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去揭露这一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的事件”。他们将兹伊拉的行为与莫迪凯·瓦努努相提并论，后者因为向外国媒体泄露了有关“以色列核武器项目”的秘密，虽然设法逃到了伦敦，最终仍被以色列情报机关诱捕回国，以“叛国罪”和“间谍罪”判处18年监禁并不得减刑。

对于扎米尔等人的指控，兹伊拉表示，数年前为了给BBC准备一部片子，他确实与阿哈龙·布雷格曼见过面，但他否认泄露了间谍的名字，或曾暗示过是谁。根据兹伊拉的说法，当年马尔万进入摩萨德的经手人代号为D，马一直坚持D作为自己的联系人，后者因此还丧失了晋升的机会。马尔万被认为是当时间谍中最高阶的，情报也被高度信任。在对D的某次简报中，马尔万甚至透露了萨达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一场高度机密的会谈。萨达特向苏联要战斗机以改善埃及空军对以色列的劣势，还想要地对地导弹从而对以色列的后方构成威胁。就在同一个会议中，萨达特还

大致勾勒出埃及对待以色列的战略。

在兹伊拉被指控后，以色列的摩萨德和军方最高层都组织了严密的调查。摩萨德的结论是马尔万是个可信的间谍，很难想象，埃及会仅仅为了要提供一名间谍可信度的证明，不惜泄露军机，陷军队于险境。但兹伊拉认为调查应该由跟战争没有牵涉的客观主体来进行。他曾要求辛贝特（即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的两名前主管进行过秘密调查，结论与他的判断相同，即赎罪日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双面间谍的骗局。

兹伊拉还对扎米尔等人的指控提出了“诽谤罪”的反诉。不过，就在不久前，以色列法庭作出判决，称兹伊拉确实泄露了情报人员的身份，违反了间谍部门的首要规则。法庭判决兹伊拉向扎米尔赔偿30,000新谢克尔，并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法院的判决终止了兹伊拉和扎米尔两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论，但严酷的现实是，马尔万没能摆脱一直以来纠缠他的间谍噩梦，甚至被进一步推向了更危险的深渊。

还会有下一个马尔万吗？

7月1日，马尔万在埃及开罗总统府附近的一个清真寺落葬，身后仍是一片有关他是否双面间谍的议论和纷扰。引人注目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及若干政府高官都参加了葬礼。葬礼由埃及最高级别的阿訇带领祈祷，马尔万的棺木上覆盖了埃及国旗，他的妻子、姐妹和其他家庭成员伴随在旁。

显而易见，马尔万戏剧性的突然死亡有许多神秘之处待解，同时，也令间谍及间谍安全再次成为各方媒体争议的话题。据说马尔万从1971年就开始写日记，生前也正在写一本有关赎罪日战争的书，已完成一半。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和所负载的许多重大机密随着他的死被一同长埋地下了。马尔万的死还促使埃及媒体回忆起所有关于在伦敦发生的埃及人死亡的故事，猜测其中也许隐藏着某种重大的秘密。因为这些事件的共同点都与情报有关，而且当事人死前都被传在写作自传。埃及金字塔政治战略研究中心政治系副主任那比勒·阿布杜勒·法塔赫提到了埃及前著名女演员、阿拉伯电影界的偶像沙特·侯斯尼之死。6年前，也是在7月，侯斯尼从其位于北伦敦的城堡寓所的阳台上跌落致死，一直有传闻称她上世纪60年代曾受雇于埃及情报部门。她在伦敦度过的最后10年被严重的抑郁和贫穷所困，死前据说正在考虑找一个出版商出版自传以挣钱维持生计。比侯斯尼再早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萨达特总统卫队的前首领莱斯·那塞夫也在伦敦身亡，他曾帮助萨达特进行政变。巧的是，他是在与侯斯尼后来所居的同一个城堡寓所的阳台上跌落的。

责任编辑：阮莹